

### 第三章 冷戰時期中印關係的地緣政治因素

「一個國家在世界上佔據的位置以及與其他權力中心的關係，決定著它的安全課題。」<sup>1</sup>

印度開國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在印度獨立前即致力於推動反殖民運動，對中國抱著同情且友善的應度。因此尼赫魯一向把中國視為印度在亞洲的天然夥伴，希望兩國能聯合起來，向把印度淪為殖民地、把中國淪為半殖民地，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挑戰，並把敗它們，自己來把握亞洲命運。<sup>2</sup>中共建政後，印度也是最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非社會主義國家。

1950年，毛澤東在接受印度駐中國大使遞交國書時，曾對中、印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有很深的期許，希望透過亞洲兩大國家的真誠合作，維持亞洲與世界的持久和平。<sup>3</sup>因此，中、印兩國關係發展，在一開始就具備了領導人企望願意建立良好關係的主觀意願。但是，由於印度繼承英國殖民時期的地緣戰略思維，將西藏作為中、印之間的地緣緩衝區，因此，當1950年中國解放軍以武力解放西藏之後，不免為兩國關係發展蒙上一層陰影。而因此伴隨而來的邊界領土爭議，更不時干擾著兩國關係的正常開展，甚至在1962年爆發邊界戰爭。

中、印爆發邊界戰爭後，雖有意改善彼此關係，但在冷戰期間，中、印兩國也僅能在美、蘇對抗格局下，緩步開展彼此關係。本章主要是分析冷戰時期的世界地緣政治格局，在此格局下的中、印兩國地緣政治環境，並探討其中的中、印地緣政治因素。

#### 第一節 冷戰時期的世界地緣政治格局

地緣政治格局是指：「在一定時期內國際關係中起主導作用的力量結構，主要取決於各國和各種力量，特別是各大國和集團之間的綜合國力對比與利益制衡的狀況。」地緣政治格局是各國，特別是各大國制定和調整內外政策的基本依據之一。<sup>4</sup>

<sup>1</sup> 張露，「地緣政治與美俄關係—從烏克蘭大選解讀冷戰後美俄關係中的地緣政治因素」，*國際政治*（北京），2006年第5期，頁47。

<sup>2</sup> 科亨（Stephin P. Cohen），劉滿貴等譯，*大象與孔雀：解讀印度大戰略*（北京：新華社，2002年10月），頁18。

<sup>3</sup> 葉自成，*中國大戰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11月），頁29。

<sup>4</sup> 王恩涌主編，*中國政治地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184。

冷戰時期的世界地緣政治格局，可以說是二次大戰後美、蘇基於自身利益考量，意圖在戰後建立起對自己有利的地緣政治背景下所形成的。二次大戰後期的 1945 年初，以美國為主的同盟國已取得絕對的優勢，勝利指日可待，由於傳統世界地緣政治中心的歐洲，在經過戰爭的蹂躪後，百廢待舉，而美國則一躍成為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遠超過任何國家的世界頭號強國。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認為，戰後，英國仍然可以成為大英聯邦的號令者，而蘇聯將成為歐亞大陸惟一軍事強國，但在經濟復原方面，將有求於美國。因此，美國可以在與英、蘇合作的基礎上，透過聯合國這個機制，維持世界的和平與穩定。然而，蘇聯領導人史達林（Joseph Vissarrionovich Stalin）亦有自己的打算，由於蘇聯在歷史上，不僅有法國的拿破倫（Napoléon Bonaparte）遠征莫斯科的陰影，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德國也都進犯至蘇聯境內，危及其國家安全，因此，如何在東歐建立起保衛蘇聯安全的屏障，成為史達林地緣戰略的最重要構想。也就是由於美、蘇在地緣利益的矛盾與衝突下，各自拉攏盟國納入己方陣營，而逐步發展成冷戰。<sup>5</sup>美、蘇對峙的兩極格局，成為貫穿整個冷戰時期最顯著的世界地緣政治特點。

#### 壹、蘇聯社會主義的擴張

二次大戰後，美國羅斯福總統希望透過與蘇聯的合作維持世界和平，他一心一意促成對蘇實行友好政策，將戰後的和平植基於互信及友善的基礎上。但是蘇聯在戰後將勢力延伸至東歐，卻破壞了此一構想。美國外交學者約翰·史班尼爾（John Spanier）從國際社會的角度，解釋蘇聯的作為。約翰·史班尼爾認為，在國際社會中，國與國之間經常發生衝突，成員彼此間缺乏信任，因此，每一個國家必須以本身的力量對抗潛在的敵人，而在對付共同敵人而成立的聯盟即將解散之際，蘇聯預先增強本身的實力，以對抗未來可能變成敵對者的國家，其實是可以理解的。特別是在四分之一個世紀內，德國曾兩次以東歐為通道，進犯蘇聯國境。也因此，美國雖然對蘇聯控制東歐的行為感到失望，但仍然默認了此一事實。<sup>6</sup>蘇聯社會主義的擴張初期主要是在歐、亞兩洲部分：

##### 一、歐洲方面

二次大戰結束後，東歐國家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兩個國家的共產黨，因在戰爭期間組織民眾與德國進行對抗，在戰後首先取得政權。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由於在二次大戰期間隨同德國出兵蘇聯，德國戰敗後，在蘇聯軍隊協助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當地的共產黨人士，亦建立了共黨政權。至於因德國侵略而淪為流亡政府的波蘭、捷克，在蘇聯軍隊的協助下，

<sup>5</sup> 王恩涌主編，*中國政治地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167-168。

<sup>6</sup> 約翰·史班尼爾（John Spanier），方海鶯譯，*當代美國外交史*（台北：桂冠圖書，1986年）頁29-33。

其留在國內的共產黨人士，則與返國的流亡人士組成聯合政府，共同執政。這些國家的共黨政府因實行經濟和社會方面的改革政策，在執政初期獲得國內人民的廣泛支持。相對在西歐國家，因為經濟復原的困難，失業、貧困造成社會的動盪不安，特別是法國與意大利，這兩個國家的共黨人士，因在二次大戰期間組織民眾對抗德國的侵略，在其國內亦擁有較高的政治聲望。<sup>7</sup>

為了避免整個歐洲淪入蘇聯的掌控，美國杜魯門（Harry S Truman）總統於1947年3月宣示了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sup>8</sup>，承諾將支持任何受共產主義威脅的地區。由於希臘與土耳其在地理位置上處於東歐的南邊，一旦這兩個國家失守，蘇聯的勢力將得以進入地中海，因此美國首先積極對希臘與土耳其進行援助，打擊這兩個國家內的共黨勢力。其次，美國提出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sup>9</sup>，希望透過經濟援助使西歐國家擺脫困境，除了使西歐成為美國在歐洲遏阻蘇聯的堡壘，亦可吸引東歐國家加入，削弱蘇聯的力量。在經濟援助的同時，美國亦積極策劃與西歐國家的政治、軍事同盟，1947年，英、法首先簽訂同盟互助條約，1948年初，英、法、荷、比、盧等國家在布魯塞爾簽訂了為期50年的多邊軍事政治條約，隨後，美國、加拿大與布魯塞爾條約簽約國商議後，再吸收丹麥、挪威、冰島、葡萄牙、意大利共12個國家，於1949年4月簽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面對美國的戰略部署，蘇聯一方面與東歐國家的共產黨成立情報局，透過彼此的協調合作，強化對東歐的掌控，而為了防止馬歇爾計畫可能對東歐國家產生的分化，蘇聯亦與東歐國家簽訂了一系列的貿易協定，加強經濟方面的合作，稱之為莫洛托夫（Vyacheslav Mikhailovich Molotov）計畫。<sup>10</sup>1954年11月29日，蘇聯與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捷克、東德、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等8個國家在莫斯科舉行「歐洲國家保障歐洲和平安全會議」，繼於1955年5月14日在波蘭的華沙簽訂「華沙公約」，成立「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Pact）軍事集團，展開與美國為首西方國家的對抗。<sup>11</sup>

<sup>7</sup> 王恩涌主編，**中國政治地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168。

<sup>8</sup> 1947年3月12日，美國杜魯門總統在國會宣讀了一篇特別諮文，杜魯門在這篇演說中強調了三方面內容：第一，美國有權領導自由世界援助他國復興的使命；第二，任何國家的人民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都會危害美國的安全，全世界自由的人民期待美國捍衛他們的自由，如果美國的領導地位動搖了，不僅會危害世界和平，而且一定會危害到美國自身的安全；第三，美國將援助各國自由人民。杜魯門要求國會撥款4億美元援助希臘、土耳其，並選派軍事人員前往執行任務，以防止共產主義威脅。杜魯門這項政策聲明，爾後被通稱為「杜魯門主義」。肖月、朱立群主編，**簡明國際關係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頁23-24。

<sup>9</sup> 又稱歐洲重建計畫。美國於1948年到1952年之間，提供16個西歐國家約170億美元的經濟援助。貝里·修斯（Barry B. Hughes），歐信宏、陳尚懋譯，**最新國際政治新論**（台北：韋伯文化，民國93年3月），頁431。

<sup>10</sup> 王恩涌主編，**中國政治地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169。

<sup>11</sup> 沈玄池，**國際關係**（台北縣：高立，2002年），頁61。

此外，美、蘇的對立，造成德國在二次大戰後長達近 40 年的分裂。由於兩次世界大戰都是由德國所發動，為了防止德國日後再度崛起，威脅世界的和平，二次大戰後期，即 1943 年 11 月，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蘇聯領袖史達林在德黑蘭舉行會議，初步決定德國投降之後，將由美、英、蘇 3 國分區佔領。1945 年 2 月，美、英、蘇 3 國領袖在克里米亞（Cremia）半島舉行雅爾達會議，針對德國問題的決議為：美、英、蘇 3 國應取得德國的最高權力，並得採取一切保障對於未來和平與安全所必需的步驟，例如分裂德國；分裂德國的程序由美、英、蘇 3 國組成委員會加以研究；美、英、蘇 3 國同意法國應分得德國一區，由法國軍隊佔領，美、英、蘇 3 國同意法國應被邀為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Kontrollrat）的委員。<sup>12</sup>

1945 年 5 月 8 日，德國宣布無條件投降，美、英、法、蘇 4 國簽署「柏林宣言」（Berliner Erklärung），確立以德國 1937 年 12 月 11 日的版圖為基準分成 4 個佔領區，由盟國加以佔領，並且由「盟軍司令部」（Allierter Kommandantur）加以管理。1945 年 7 月 17 日至 8 月 2 日，美、英、蘇 3 國領袖再度於柏林近郊的波茨坦舉行會議，會後發表波茨坦宣言（Potsdam Declaration），其中涉及德國問題的要點為：美、英、法、蘇 4 國軍事司令部，依其本國政府訓令行使在德國最高權力，依管制委員身份，在各國佔領區內及在整個德國共同行使權力；徹底解除武裝，消除德國軍國主義；德國經濟改造，應著重於農業與國內和平工業的發展；在佔領時期之內，德國應被視為一個「經濟整體」（Wirtschaftliche）。<sup>13</sup>

1945 年 9 月，蘇聯在其德國佔領區內進行土地改革，美、英、法 3 國則在其佔領區內開放民主政黨活動，實施地方選舉。由於蘇聯實施的共產主義與美、英等國的制度完全不同，隨著美、蘇在歐洲各自擴充勢力的同時，德國亦成為美、蘇兩強角力的戰場。1948 年，英、法、荷、比、盧等國家簽署了布魯塞爾共同防禦協定，蘇聯德國佔領區司令退出盟國管制委員會以表達抗議，4 國佔領區共同行政機構被迫終止。1948 年 4 月，蘇聯進一步封鎖西方盟國通往西柏林的鐵、公路及水的供應，引發柏林危機（二次大戰後，有關美、蘇因柏林所引起的危機爆發，尚包括 1961 年柏林圍牆興建在內，但讓強權國家關係最為緊繃的仍是 1948 年的柏林封鎖危機。<sup>14</sup> 1949 年 4 月，美、英、法 3 國通過佔領條款（Besatzungs-Statuts），允許西方佔領區內的德國人建立臨時政府，同年 5 月，西德之議會委員會通過基本法，德意志聯邦共和國（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正式成立，即為一般所稱之西德。蘇聯為求反制，隨後於 1949 年 10 月扶持其佔領區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Deutsche

<sup>12</sup> 沈玄池，**國際關係**（台北縣：高立，2002 年），頁 50。

<sup>13</sup> 沈玄池，**國際關係**，頁 51。

<sup>14</sup> 貝里·修斯（Barry B. Hughes），歐信宏、陳尚懋譯，**最新國際政治新論**（台北：韋伯文化，民國 93 年 3 月），頁 157-158。

Demokratische Republik)，即一般所稱之東德。<sup>15</sup>自此德國分裂成為東、西德的情勢已然確立，以美、蘇兩大陣營進行對抗的世界兩極格局，正式成形。<sup>16</sup>

## 二、亞洲方面

二次大戰的亞洲戰區，以日本無條件投降而告終。在中國，國民黨雖然遭受共產黨的挑戰，但大致享有統治權。然而，由於經濟環境遲遲未能改善，加以內部的貪污腐化，民心向背，政權基礎逐漸流失，中國共產黨在蘇聯幕後支持下，大有取代國民黨政權之勢。美國基於防止日本帝國主義再起及蘇聯透過中國共產黨控制中國，乃支持國民黨的蔣介石政權，冀望中國能成為美國在遠東地區的可靠盟友。<sup>17</sup>惟國共內戰情勢在 1948 年 9 月有了重大轉變，共軍在幾場大的戰役中取得勝利，蔣介石發表聲明引退。1949 年 4 月 1 日，國民政府與共產黨代表在北京進行談判，但因談判不成，解放軍大舉渡江，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中國共產黨於 1949 年 10 月 1 日正式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並且一邊倒地倒向以蘇聯為首的共黨陣營。<sup>18</sup>

在朝鮮半島方面，蘇聯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後，除了迅速佔領中國的東北地區外，而且與金日成領導的抗日武裝部隊進入朝鮮部署。美國在軍力難以部署情況下，與蘇聯協商擬定了一個以北緯 38 度線為界，作為與蘇聯分區接受日軍投降的方案，於是朝鮮半島分為南、北兩部分，由美、蘇兩國軍隊所佔領。隨著美、蘇在歐洲勢力衝突的加劇，美、蘇基於各自戰略利益，分別於 1948 年 8 月、9 月，在各自佔領區內協助建立大韓民國（南韓）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韓）。<sup>19</sup>

由於南、北韓政權對於朝鮮半島的統一方式，毫無交集之處，因此積極擴充軍備為以武力統一朝鮮作準備。1950 年 5 月 25 日，北韓軍隊越過北緯 38 度線，直撲漢城，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立即向南韓增加美國軍援、空中掩護，以及地面部隊。戰事初期，聯軍部隊一路退守，至美國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指揮盟軍成功在北韓防線後方的仁川（Incheon）登陸後，盟軍開始反攻，並於 10 月 19 日佔領北韓首都平壤（Pyongyang）。由於麥克阿瑟將軍指揮盟軍大有一舉渡過鴨綠江之勢，中國決定以「志願軍」名義派兵支援北韓作戰。中國解放軍於 1950 年底發動全面進擊，迫使盟軍南退至北緯 38 度線以南，至 1951 年 1 月，甚至佔領了漢城，但盟軍隨後集結軍力反攻

<sup>15</sup> 沈玄池，**國際關係**（台北縣：高立，2002 年），頁 53-54。

<sup>16</sup> 王恩涌主編，**中國政治地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69。

<sup>17</sup> 1954 年美國杜魯門總統任命馬歇爾為使華特使，希望促成國民黨與共產黨間的停火協議，儘早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以達成中國的和平統一，然終因國、共之間的分歧太大，馬歇爾的調停任務於 1947 年 1 月以失敗告終。艾里曼（Bruce Elleman），李厚壯譯，**近代中國的軍事與戰爭**（台北：時英，2002 年），頁 388。

<sup>18</sup> 王恩涌主編，**中國政治地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72-173。

<sup>19</sup> 王恩涌主編，**中國政治地理**，頁 175。

奪回漢城，重新守穩北緯 38 度線。之後，中國解放軍再發動多次攻擊，但始終無法撼動盟軍基地，兩軍各據北緯 38 度線一邊，而形成僵局。<sup>20</sup>

韓戰爆發後，美軍由麥克阿瑟將軍領軍參戰，從地緣政治分析美國立場，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已經讓美國在大陸的利益的喪失殆盡，一旦南韓再次淪為親蘇政權之手，對美國在亞洲地緣政治利益的傷害將是難以彌補。而就中國立場而言，朝鮮半島位於中、日之間，日本侵華是先佔朝鮮，再攻東北，最後侵入華北。如果朝鮮半島落入美國之手，東北則失去安全屏障，而東北具有新中國迫切需要的工業化基礎，必需加以鞏固。此外，美軍如果控制朝鮮半島，控制台灣，不僅影響國家統一的進程，整個新中國處於美國的戰略包圍之下，等於永無寧日。因此，唇亡齒寒，要保家衛國，就必須抗美援朝。韓戰從 1950 年 5 月爆發，經過多次談談打打、邊談邊打，戰線回到原先的北緯 38 度線，而呈現軍事對峙局面，最終於 1953 年簽訂停戰協議，<sup>21</sup>朝鮮半島維持南、北韓對峙局面，一直至今。

## 貳、美國對蘇聯的圍堵

不同於美國對於蘇聯於戰後迅速控制東歐的作為，所表現出刻意的忽視，英國首相邱吉爾於 1946 年初，在美國密蘇里州富爾敦市一場向美國民眾的公開演講中，表達了他對蘇聯擴張主義的憂心。邱吉爾表示，蘇聯是一個實行擴張主義的國家，由波羅的海的史坦丁（Szczecin，是波蘭的第七大城市和第二大海港）到亞得里亞海的翠斯特（Trieste，是義大利東北部距威尼斯和斯洛維尼亞邊境靠近的一個港口城市，），已落下了一條橫越大陸的鐵幕（Iron Curtain）。所有中歐與東歐古老國家的首都，包括華沙、柏林、布拉格、維也納、布達佩斯、柏爾格雷德、布徹瑞斯特和蘇菲雅，都被劃入鐵幕之內，所有著名的城市及其居民，都被劃入蘇聯的勢力範圍之內，並以某種方式向蘇聯臣服，他們不僅受蘇聯影響，並且受到來自莫斯科日益嚴密的控制。邱吉爾認為，蘇聯正在進行無限制的擴張自己的勢力與主義，而這種情勢只有藉由大英國協和美國的力量，才能予以遏止。<sup>22</sup>但顯然，美國在這個時候，還沒有準備好接受這個看法。

### 一、喬治·肯楠（George Kennan）對蘇聯的遏制構想

喬治·肯楠（George Kennan），是 20 世紀 40 年代中期美國駐蘇聯使館的外交官，喬治·肯楠在 1946 年 2 月一封發回華府的長電中，提出了他對於蘇聯

<sup>20</sup> 艾里曼（Bruce Elleman），李厚壯譯，**近代中國的軍事與戰爭**（台北：時英，2002 年），頁 403-404。

<sup>21</sup> 王恩涌主編，**中國政治地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75。

<sup>22</sup> 約翰·史班尼爾（John Spanier），方海鶯譯，**當代美國外交史**（台北：桂冠圖書，1986 年），頁 37。

行為的觀察，他認為蘇聯官方對於外部世界的認知及其行為，是蘇聯傳統不安全感產物的產物，而蘇聯統治者學到謀求安全的唯一方法，就是徹底毀滅與它競爭的國家，進行耐心、殊死的鬥爭，絕不與對手達成妥協或協議。喬治·肯楠在電文的結論中提到，美國面對著的蘇聯是這樣的一個政治力量，它狂熱的相信，它同美國之間不可能有永久性的妥協，它堅信，只有破壞和擾亂美國的內部和在國際舞台上的權威，蘇聯政權才能得到鞏固。美國必須擁有足夠的武力，並準備使用武力，才能避免「攤牌」，必須把蘇聯看成是政治上的對手，而不是夥伴。<sup>23</sup> 喬治·肯楠認為：「蘇維埃政權有其內在的矛盾，它必須向外擴張，西方國家應堅定抵抗，如果蘇聯有侵略自由國家的徵兆時，應立即使之面臨一個強烈的對抗力量。而西方國家本身亦應力求政治、社會和經濟的健全，採取此種長期而堅定的政策，會使蘇聯無法向外擴張，因而可以助長蘇聯的內在矛盾而使其力量分裂或軟化。」<sup>24</sup>

1947年，喬治·肯楠以“X先生”為筆名在美國外交季刊發表「蘇聯行為的根源」乙文，喬治·肯楠在這篇文章中完整地闡述了它對於蘇聯的遏制構想，他認為蘇聯在其對外行為中，表現出兩個政治性格：第一是既敵視西方又願意同西方和平共處；第二是既固執又靈活，即蘇聯政權的目標是僵硬和固執的，但在追求自己的目標時，又是謹慎和靈活的。喬治·肯楠再度將造成此種政治性格的蘇聯行為，歸結為蘇聯內部固有的不安全感。喬治·肯楠認為，在二次大戰後能對美國國家利益構成威脅的力量主要是蘇聯，因為從地緣政治上看，蘇聯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強國，而戰後國際政治格局的主要特徵是美、蘇兩大力量相互對峙的雅爾達格局。從意識形態上看，美、蘇則分別是最大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地緣政治與意識形態因素複雜交織在一起，使得蘇聯成為美國追求國家利益時的最大威脅與障礙。因此，限制和減少蘇聯的影響，就成為戰後美國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sup>25</sup> 由於，蘇聯在鞏固了其於東歐的地位之後，又繼續向外擴張勢力，其範圍甚至超越了盟軍在戰爭期間所劃定的界線時，美國終於不得不採取反制措施。而喬治·肯楠提出對蘇聯的遏制構想，則成為美國從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對蘇聯採取圍堵政策的理論依據。

知名的國際政治與戰略學者柯林·葛雷（Colin S. Gray）認為，提出心臟地帶學說的麥金德爵士，可以說是二次大戰後美國對蘇聯圍堵政策的啟發者。喬治·肯楠提出對蘇聯的遏制構想，事實上是受到麥金德的世界觀的影響。<sup>26</sup> 此外，美國地緣政治學者斯派克曼在二次大戰期間，也提出了具戰略意義的“邊緣地帶”概念。斯派克曼在**和平的地理學**乙書中認為，處於歐亞大陸與近海之間

<sup>23</sup> 尚月、朱立群主編，**簡明國際關係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頁19-20。

<sup>24</sup> 沈玄池，**國際關係**（台北縣：高立，2002年），頁60。

<sup>25</sup> 尚月、朱立群主編，**簡明國際關係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頁20-21。

<sup>26</sup> Colin S. Gray. *The geopolitics of super power.* (Lexington, 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8), p4.

的邊緣地帶，在全球戰略中的作為最為重要，因此，他提出“誰支配著邊緣地帶，誰就控制著歐亞大陸，誰支配著歐亞大陸，誰就掌握了世界的命運”。斯派克曼的觀點，同樣對二次大戰後美國的外交戰略發揮具體且重要的影響，面對蘇聯社會主義的擴張，美國積極推行控制歐亞大陸邊緣地帶的擴張政策，除了1949年主要以歐洲國家為主簽訂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外，從1950年10月至1951年9月，美國相繼與泰國簽訂《軍事援助協定》，與菲律賓簽訂《共同防禦條約》，與澳大利亞、紐西蘭簽訂《安全條約》，與日本簽訂《安全條約》；從1953年至1954年，美國再與南韓、台灣簽訂《共同防禦條約》，組織起從日本海經台灣海峽至麻六甲海峽的第一道封鎖線，和從阿留申群島經馬里亞納群島到紐西蘭、澳大利亞的西太平洋的第二層包圍圈。1954年9月，美國與泰國、菲律賓、紐西蘭、澳大利亞、巴基斯坦、法國與英國，簽訂了《東南亞防禦條約》，成立東南亞軍事集團，將包圍圈延伸至南亞次大陸。1955年，在美國的支持下，英國、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組成「中央條約組織」，通過「中央條約組織」，連結了「東北亞防禦聯盟」、「東南亞軍事集團」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於是從東北亞經西太平洋、東南亞、中東、地中海、西歐，一直到北大西洋，將以蘇聯為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包圍在歐亞大陸內的軍事聯盟體系。<sup>27</sup>

面對美國的圍堵策略，蘇聯亦力求突圍之道。1958年，古巴軍事強人卡斯楚（Fidel Castro）發動軍事政變取得政權，並向社會主義陣營靠攏，美國與古巴關係惡化。<sup>28</sup>為推翻卡斯楚政權，美國甘迺迪（John F. Kennedy）總統於1961年4月，透過美國中情局發動豬灣事件<sup>29</sup>，但其戲劇性的失敗結果，卻反而加速的將古巴推向蘇聯一邊。1962年秋季，美國情報機構發現蘇聯正在古巴興建中程彈道飛彈的發射場，面對蘇聯在距離美國海岸僅90英里之處設置飛彈，美國再也無法無動於衷，並採取堅定的立場。因此，球到了蘇聯的手上，反而是蘇聯必須決定，是否要掀起戰爭——即突破美國對載有飛彈的蘇聯船艦的封鎖。<sup>30</sup>最終，克里姆林宮選擇放棄，一場可能引發核子戰爭的危機，方告解除。

## 二、美國對蘇聯的圍堵的特性

<sup>27</sup> 王生榮主編，**金黃與蔚藍的支點：中國地緣戰略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0年12月），頁234-235。

<sup>28</sup> 沈玄池，**國際關係**（台北縣：高立，2002年），頁69。

<sup>29</sup> 美國於1961年4月，透過中情局支持一小股流亡在外的古巴人的力量，圖謀登陸古巴，推翻卡斯楚政權，這些流亡者多係卡斯楚昔日的夥伴，整個行動的計畫在艾森豪政府時代即開始籌劃，甘迺迪上任後決定繼續給予支持。美國中情局相信，這些古巴流亡者一旦登陸豬灣建立橋頭堡之後，古巴人民和一些軍隊將會歡迎這些侵入者，視之為解救古巴的王師。然而，因為缺乏正確的計畫，事先未在古巴境內安排好配合的行動，古巴人民反卡斯楚的情緒未達成熟階段，其結果是一敗塗地。約翰·史班尼爾（John Spanier），方海鶯譯，**當代美國外交史**（台北：桂冠圖書，1986年），頁173-174。

<sup>30</sup> 約翰·史班尼爾（John Spanier），方海鶯譯，**當代美國外交史**（台北：桂冠圖書，1986年），頁175-177。



美國學者約翰·史班尼爾研究美國為遏制蘇聯擴張主義所採取的圍堵政策，認為美國基於當時的持保守孤立的國內情勢，面對蘇聯在二次大戰後屢次所做的挑釁舉措，雖然採取看似積極且堅定的圍堵政策，但仍有其特性存在。<sup>31</sup>

第一，美國由實行孤立主義，主張世界其他地區之爭執不會危及本身安全的國家，轉變成參與世界事務，採取介入全球各個地區的做法，並且沿著其視為重要的地區，劃出了「界線」。

第二，美國必須持續地努力保護這些「界線」的安全，並且加以監視。透過軍事與外交戰術交互運用進行核子恐嚇，或是發動邊界戰爭於實際上封鎖邊界，以對付有限的挑釁。

第三，在正常的狀況下，這些挑釁發生的地點，都是在距離美國最遙遠之處，主要是因為邊界本就地處偏僻，敵對者認為在這種地區比較容易製造事端，而防衛者也比較缺乏解決的意願。

第四，美國確信在權力呈現兩極發展的國際體系中，全面或有限的嚇阻若欲奏效，必須以敵對國相信進行嚇阻的國家必然會履行其承諾，作為先決條件。無論是被迫接受或自願負擔的承諾，一旦決定之後，除非因此會導致危險的後果，否則無論如何是不可能撤回的。

第五，由於美國的盟國和友邦都了解本國的國防必須依賴美國保護，因此他們都時時提高警覺，注意美國保護之意願是否有減弱的徵兆，假若發現憂慮屬實，他們可能會仔細考慮與敵對國接近，並與之談判禱獲得最好的條件。

### 參、美蘇中地緣三角關係的質變

二次大戰後，由於中國奉行一邊倒向蘇聯的地緣戰略，加以韓戰的爆發，中、蘇成為緊密夥伴，共同對付美國的圍堵政策。但在 1950 年代後期，美蘇中地緣三角關係開始產生質變。

1958 年 4 月 18 日，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Malinovshky, Rodion Yakovlevich）向中國提出建立一座長波電台的要求，用於指揮蘇聯在太平洋地區活動潛艇，中國表示願意負擔建造經費，由中、蘇共同使用，但該長波電台的所有權必須歸中方所有。同年 7 月 21 日，蘇聯再提出與中國建立聯合艦隊的要求，但因中國不願在境內為蘇聯提供軍事基地而予拒絕。再加上中國發動對金門炮擊事件，並未事先知會蘇聯，中、蘇之間的分歧與矛盾逐漸擴大，1959 年 6 月，蘇聯率先撕毀 1957 年 10 月簽訂，向中國提供國防新技術的協定，

<sup>31</sup> 約翰·史班尼爾（John Spanier），方海鶯譯，*當代美國外交史*（台北：桂冠圖書，1986 年），頁 232-234。

1959年9月9日，蘇聯透過官方塔斯社發表聲明，在中印邊界衝突的問題上，明顯偏袒印度一方。1960年6月，蘇聯先是在羅馬尼亞召開的社會主義國家兄弟黨代表布加勒斯特會議中指責中國，再於同年7月宣布，1個月內撤走全部在華的專家，撕毀專家合同及專家補充書243個，廢除科學技術合作項目257個，至此，中、蘇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正式公開於世人之間。<sup>32</sup>

1960年代中期，由於中蘇關係緊張，具體的反映就是邊界衝突事件不斷，其中以中國西部與蘇聯接壤的國界最為尖銳。至1960年代末期，中、蘇則是在沿著烏蘇里江及黑龍江爆發一連串邊界衝突事件，<sup>33</sup>最終於1969年爆發中蘇珍寶島衝突事件。<sup>34</sup>珍寶島事件後，中、蘇雙方各自在邊界部署重兵，蘇聯取代美國成為中國最大的安全威脅。

在美國方面，由於1965年介入越戰，數十萬美國大兵身陷戰場泥沼無法脫身，國內也爆發大規模的反戰風潮，加以蘇聯在1968年出兵捷克，又強化了對東歐的控制，因此，美國急需調整其戰略，除擺脫越戰的糾葛外，也要加強與蘇聯在全球的爭奪。<sup>35</sup>中蘇珍寶島事件後，蘇聯駐美大使杜布萊寧（Anatoly Dobrynin）向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季辛吉（Heinz Alfred Kissinger）表達對中國的不滿，季辛吉將此一情形向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總統報告，認為美國或許可以在中、蘇衝突中漁翁得利，此後，季辛吉持續對中國問題加以關注。隨著中、蘇衝突加劇，尼克森政府對於蘇聯是否入侵中國表達憂心，放話表示強烈反對蘇聯對中國發動軍事行動。美國國務院次卿李察遜（Elliot Richardson）1969年9月在紐約出席美國政治學會年會時，聲稱：「在共產中國這個案例上，長期改善雙方關係，符合我國自身利益……我們不能不深切關心，這項爭執升高後，會嚴重危害國際和平及安全。」<sup>36</sup>這是尼克森政府向中國主動釋出的善意，也顯示尼克森開始著手實現要與中國改善關係的對華政策。<sup>37</sup>

<sup>32</sup> 王恩涌主編，**中國政治地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176-177。

<sup>33</sup> 中國外長陳毅於1960年代中期，曾控訴蘇聯在1960年至1965年間，總共挑起近5,000件的邊界衝突。艾里曼（Bruce Elleman），李厚壯譯，**近代中國的軍事與戰爭**（台北：時英，2002年），頁464。

<sup>34</sup> 珍寶島為中俄邊界烏蘇里江中的一個小島，中、蘇雙方均稱對該島擁有主權，中蘇關係惡化後，僅在1969年1月至2月間，中、蘇在珍寶島的衝突就達8次之多。1969年3月2日蘇聯派遣全副武裝部隊與裝甲車從西北兩面侵入該島，與中國軍隊爆發激烈戰鬥，事後中國宣稱擊斃入侵者31人，擊傷14人；但中國方面同樣死傷十分嚴重。沈玄池，**國際關係**（台北縣：高立，2002年），頁71。

<sup>35</sup> 王恩涌主編，**中國政治地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178-179。

<sup>36</sup> 孟捷慕（James Mann），林添貴譯，**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密**（台北：先覺，1999年），頁37。

<sup>37</sup> 事實上，尼克森早在1967年預備東山再起爭取共和黨提名參選總統時，就曾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季刊上發表一篇名為「越戰後的亞洲」的文章。尼克森在這篇文章中說：美國的任何亞洲政策都必須迫切掌握中國的現實。……就長期而言，我們根本不能聽任中國永遠停留在國際家庭之外，抱持幻想與仇恨，並威脅鄰國。我們這個小小星球，不容十億具有能幹潛力的人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況中。……中國若不改變，世界不會安全。因此，我們的目標是在力

隨後，尼克森政府開始試圖與中國建立對話管道。1970年1月20日及2月20日，美國駐波蘭大使史托賽爾（Walter Stoessel）兩度與中國駐波蘭大使館代辦雷揚會晤，傳達出有心改變過去敵對關係的訊號，並向中方表示尼克森政府有意派遣一位特使到北京，或是在華府接見一位中國代表，以進行「更詳盡」的對話，雷揚則回覆史托賽爾：「如果美國政府有望派遣一位部長級代表或總統特使到北京……中國政府願意接見他。」由於，有國務院官員對尼克森對華政策的遽然改變，感到憂心，尼克森與季辛吉遂決定自行秘密開展對華政策，透過美國中情局駐巴基斯坦人員、美國駐香港總領事、巴基斯坦駐華大使、挪威駐中國大使等秘密管道，<sup>38</sup>開啟與中國的一連串交涉行動。

在中國方面，對於1969年初上台的尼克森總統，原並沒有抱以太大的期待，<sup>39</sup>但在尼克森主動釋放有意改善對華政策的訊息後，面對蘇聯在邊境陳兵百萬的壓力，為了改善兩面受敵的不利環境，也願意超越意識形態的歧異，從地緣政治利益思考，改善與美國的關係，共同反對蘇聯的霸權威脅。美、中從1950年代冷戰初期的相互敵視，到1970年代冷戰中期開始聯手遏止蘇聯，成為冷戰期間地緣政治格局轉變的最重要因素。

## 第二節 冷戰時期的中、印地緣政治環境

地緣政治環境是指：「國家的地理位置、疆域、地形、資源、國力、利益關係等因素，及在基礎上形成的國際政治力量的地理結構及其相互關係。」地緣政治環境是判斷國防形勢、制訂國防戰略、進行國防建設的重要依據。<sup>40</sup>冷戰時期中印關係發展，與中、印當時所面對的地緣政治環境息息相關。因此探究當時中、印所各自面對的地緣政治環境，有助於理解冷戰時期中印關係的地緣政治因素。

### 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地緣政治環境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10月成立初時，由於整個世界已形成以美、蘇為首兩大陣營對立的兩極格局，出於對蘇聯於建政初期提供的協助與共同的意識形態和政治信仰，及美國仍支持退守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中國提出並奉行依

---

所能及的範圍內，引導其變革。孟捷慕（James Mann），林添貴譯，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密（台北：先覺，1999年），頁30。

<sup>38</sup> 孟捷慕（James Mann），林添貴譯，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密（台北：先覺，1999年），頁39-42。

<sup>39</sup> 中國在尼克森就職上任之後不到一個月內，致美國官員的一封抗議照會中，仍指斥尼克森與其前任總統詹森是「一丘之貉」。孟捷慕（James Mann），林添貴譯，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密，頁30。

<sup>40</sup> 樓耀亮，地緣政治與中國國防戰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頁43-44。

附蘇聯的“一邊倒”地緣戰略。<sup>41</sup>

雖然中國一面倒向蘇聯，獲得蘇聯提供資金貸款，及派遣一些技術專家協助實施計畫經濟。但由於國民經濟受到嚴重破壞，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濟經濟封鎖，又與週邊的新興獨立國家產生了領土糾紛等問題，因此，當時新中國面對的，可以說是內憂外患的惡劣地緣政治環境。

### 一、對內方面

由於長期的內戰破壞，城市與農村呈現民生凋敝情形。同時，在南部、西部和西北的偏遠地區，還有國民黨或地方軍閥的殘餘武裝部隊，亟待清除。嚴重的糧食短缺導致營養不良、饑荒、暴亂和搶劫；城市裡，則因幫派、吸毒、妓女等長期存在的犯罪問題，引發新的犯罪浪潮。以及在農村實施土地改革初期，所形成的暴力行為與混亂局面。<sup>42</sup>整體而言可區分為：

#### （一）國家領土尚未統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1949 年 10 月 1 日成立時，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仍有近 200 萬軍隊固守在華南、西南地區及沿海島嶼，與共產黨軍隊進行對抗。其中主要是由共產黨林彪所率領的第四野戰軍、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的第二野戰軍、陳毅率領的第三野戰軍，與國民黨白崇禧、湯恩伯、胡宗南等集團實施作戰。由於戰事不利，國民政府於 12 月中旬，決定將國民政府首都遷往台灣省台北市。至 1950 年 3 月上旬，共產黨部隊追擊國民黨軍隊的作戰，已取得壓倒性的勝利，並繼續向固守在海南島的國民黨殘留部隊發起攻擊。4 月底解放軍攻克海南島，並在 5 月中旬國民黨撤退據守在舟山群島的部隊後，完成佔領，國民黨軍隊則退守台、澎、金、馬地區。

在對國民黨軍隊作戰的同時，共產黨第二野戰軍第五兵團第十八軍，在西北軍騎兵部隊的支援下，於 1950 年 3 月向西藏進軍，至 1950 年 10 月，人民解放軍攻克昌都。1951 年 4 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以阿沛阿旺晉美等人為代表，至北京與中央政府進行談判，雙方達成《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勒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協議中規定，將帝國主義侵略勢力驅逐出西藏，西

<sup>41</sup> 毛澤東在 1949 年 6 月 30 日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出：一邊倒，是孫中山的 40 年經驗和共產黨的 28 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 40 年和 28 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而毛澤東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與內部情況，作出了站在蘇聯一邊的“一邊倒”戰略決策。樓耀亮，**地緣政治與中國國防戰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年 6 月），頁 109-116。

<sup>42</sup> 邁斯納（Maurice Meisner），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 3 版（1999）（香港：中文大學，2005 年），頁 56-87。

藏地方政府協助解放軍入藏。同年 10 月，人民解放軍依該協議進駐西藏首府拉薩，除國民黨政府據守台、澎、金、馬，及香港、澳門尚未回歸之外，中國已大體完成領土的統一。<sup>43</sup>

## （二）國民經濟千瘡百孔：

由於對日八年抗戰，加上隨之而來的國共內戰，新中國成立後呈現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國民經濟。由於封建制度遺留下的不合理土地制度，佔農村人口總數不到 10% 的地主、富農，約佔有農村中 70—80% 的土地；而佔農村人口總數 90% 的貧農、僱農和中農，僅佔 20—30% 的土地。貧、僱農和大多數中農終年辛勞，卻難求溫飽，農村普遍呈現凋敝景象。在城市方面，由於工業設施受到破壞，城市居民失業情形十分嚴重，加上國家財政收入不足，新政府面臨龐大的財政開支，乃先以增加貨幣供給以彌補龐大的財政赤字。但此種做法，在不少資本家囤積居奇，及哄抬物價的推波助瀾之下，卻引發了新的通貨膨脹和物價急遽波動的後遺症。

新政府一方面沒收官僚資本企業，另一方面，則採取管制、徵購、徵用、代管等手段，將外國資本企業一併收歸國有，再透過行政手段打擊不法資本家，穩定物價。但財政狀況剛得到疏緩，另一個困難立即出現。由於新政府打壓物價獲得明顯效果，過去因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商業投機所形成的繁榮假象消失。資本家大量拋出原先囤積的貨物，因而形成市場供過於求，不少私營工商業停工，又增加了大量失業工人，經濟面臨一連串的危機。1950 年 6 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七屆三中全會，決定進行土地改革、調整工商業、穩定物價、鎮壓反革命，及展開“三反”、“五反”運動。同時，在國營工礦交通企業全面進行改革，至 1952 年底，國民經濟初步始完成恢復階段。<sup>44</sup>

## 二、對外方面

中國共產黨建政之前，歐洲和亞洲已陸續建立了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整個世界逐漸形成以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對抗以資本主義國家美、英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毛澤東決定一邊倒的倒向蘇聯後，首先與蘇聯建立正式外交關係，隨後陸續再與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等社會主義國家完成建交。為因應美國對中國進行的政治孤立、軍事遏制及經濟封鎖政策，中國總理周恩來於 1950 年 1 月 20 日率龐大訪問團至莫斯科訪問。2 月 14 日，中、蘇雙方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蘇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中蘇關於蘇聯貸款給中華人民

<sup>43</sup> 柏福臨、王作坤、孫友葵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哈爾濱市：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8 年 12 月），頁 6-12。

<sup>44</sup> 柏福臨、王作坤、孫友葵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頁 18-23。

共和國的協定》。在蘇聯的幫助下，使得中國的國際地位獲得確立。<sup>45</sup>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美國總統杜魯門決定介入，並派出第七艦隊協防台灣，中國總理周恩來發表聲明譴責美國。10月8日，中國決定以「中國人民志願軍」名義，派遣解放軍進入北韓作戰，儘管美國軍力優予中國，但在經過多次大規模戰役後，仍未取得明顯優勢。歷經多次「打打停停、停停打打」，雙方於1953年7月達成停戰協定。整個韓戰期間，中國派出解放軍兵力達數百萬人，在戰鬥中傷亡人數估計，則由45萬至100萬人不等，<sup>46</sup>可以說為韓戰付出非常慘重代價。但也有西方學者認為，中國在韓戰的「勝利」，不僅拓寬了中國的地緣政治視野，更從軍事、外交及區域三方面，改變了東亞的權力平衡，使得中國得以重新確立身為亞洲主要強權的歷史主張，並在最終導致中國與周邊鄰國（印度）爆發更進一步的軍事衝突。<sup>47</sup>

## 貳、印度獨立後地緣政治環境

二次大戰後，民族運動風起雲湧，於1876年淪為英國殖民地的印度，也於1946年9月宣佈獨立。惟印度隨即面臨印巴分治過程所導致國內經濟發展停滯、社會動盪不安，及巴基斯坦獨立後，因為領土爭議與巴基斯坦爆發戰爭的困難局面。印度當時所面對的惡劣地緣政治環境，相較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實不遑多讓。

### 一、克什米爾領土爭議

二次大戰後，英國政府為結束殖民統治，替印度設計了印、回分治計劃，按居民的宗教信仰，將印度分為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自治領，而565個土邦可以自由選擇加入印度或是巴基斯坦。但直到印、巴兩個自治領成立時，仍有朱納得、海德拉巴及克什米爾等3個土邦的歸屬尚未獲得確定。印度獨立後，即透過軍事手段先行併入朱納得及海德拉巴。1947年10月，克什米爾地區爆發印度教徒和回教徒間的衝突，巴基斯坦邊界地區部隊進入克什米爾。印度政府隨後在克什米爾土邦王公請求下，亦派兵前往，印、巴兩國為了爭奪克什米爾爆發了第一次戰爭<sup>48</sup>。1948年1月，在聯合國調停下，雙方劃定停火線，克什米爾被分割成印控區和巴控區。此後，克什米爾印控區內的回教激進份子，在

<sup>45</sup> 柏福臨、王作坤、孫友葵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哈爾濱市：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12月），頁13-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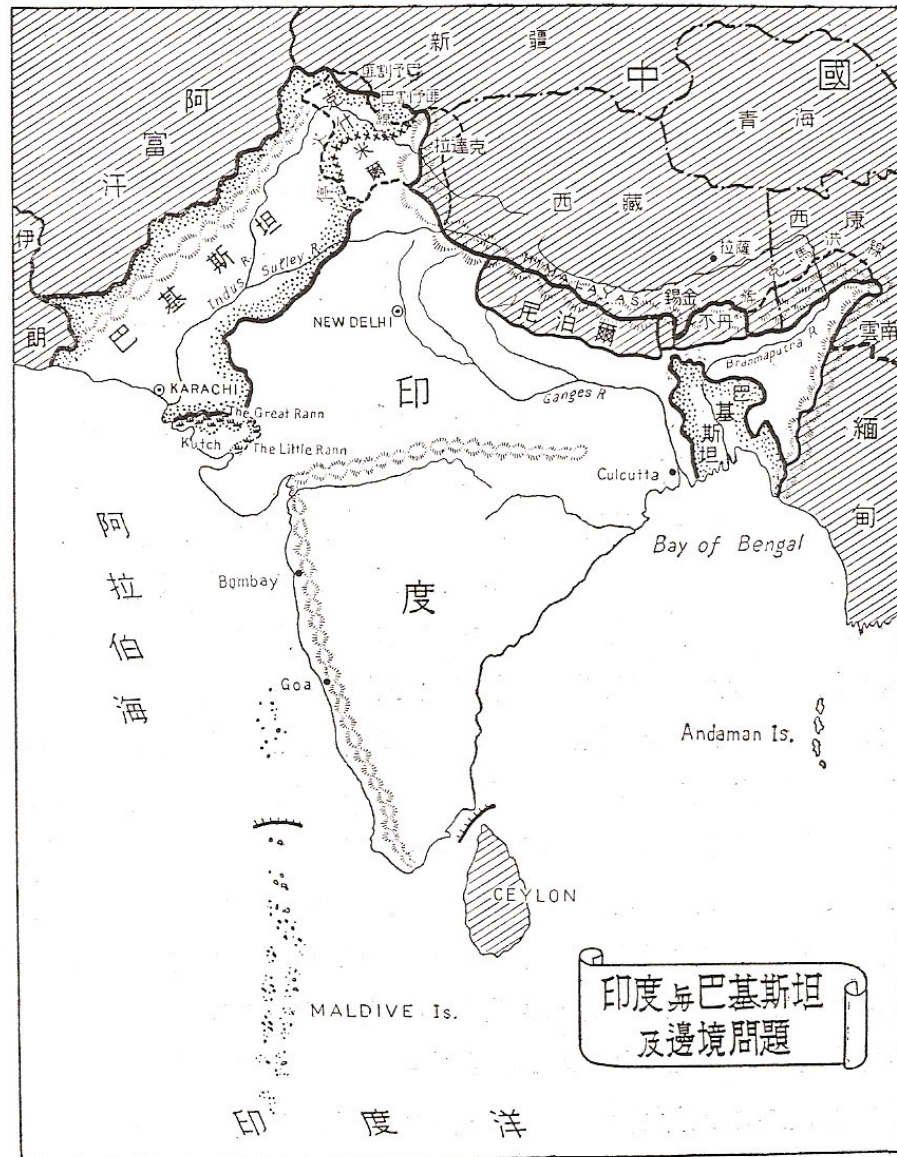
<sup>46</sup> 艾里曼（Bruce Elleman），李厚壯譯，**近代中國的軍事與戰爭**（台北：時英，2002年），頁430。

<sup>47</sup> 艾里曼（Bruce Elleman），李厚壯譯，**近代中國的軍事與戰爭**，頁403-433。

<sup>48</sup> 印、巴分治後，分別在1947、1965及1971年爆發3次戰爭，其中1947及1965年2次戰爭，都與克什米爾爭端有直接關聯。

巴基斯坦的同情與支持下，與印度政府進行長期的武裝鬥爭。<sup>49</sup>

圖 3-1：印度與巴基斯坦領土爭論地區



資料來源：沈默，**地緣政治**（台北：中央圖書供應社，1967年7月），頁217。

## 二、內部分離主義

印度本身是一個多語言與民族的國家，獨立後印度政府隨即面對國境內許多少數民族所掀起的民族主義運動。有些較具實力基礎的土邦，要求獨立的呼聲此起彼落，例如南印度的泰米爾族、西北部的錫克族、東北部的那加族等，

<sup>49</sup> 榮鷹，「印巴關係中的宗教和民族因素初探」，**國際問題研究**（北京），2006年第2期，頁32-33。



紛紛要求脫離印度聯邦，另建獨立國家。<sup>50</sup> 巴基斯坦獨立後，與印度爆發的戰爭衝突，更加深此一問題，迫使印度政府多次對邦界進行重新劃分。然而，由於印度人民使用的語言實在太過複雜，邦界重整不易，1956年2月所進行的邦界重整，甚至造成全國的騷動不安。<sup>51</sup> 此外，印度內部的宗教衝突<sup>52</sup>、種姓制度<sup>53</sup>，不僅是在獨立初期，甚至直到現今，都是引發印度內部政治不安的重要因素。

### 第三節 中、印地緣政治因素之探討

印度獨立後，總理尼赫魯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針就是，聯合第三種勢力，獨立於東、西兩個陣營之外，以追求最大的國家利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面對內部對中國共產黨政權仍有戒心之異見，尼赫魯仍堅持中、印應開展友好關係的主張，並於1949年12月30日，繼緬甸之後成為第二個承認中共政權，並先予緬甸，成為第一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非共產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面對國共內戰期間，獲印度支持、獨立之心已蠢蠢欲動的西藏，不顧韓戰即將惡化的局面，先於1950年10月19日派兵西昌，隨後於1951年4月29日，迫使西藏代表在北京簽署《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印度多次發表強硬聲明，也無法改變中國維護領土主權統一的決心。<sup>54</sup> 儘管中、印兩國因西藏問題而時有齟齬，但雙方在基本上仍維持友好的氣氛。如1953年，中國總理周恩來在提到中印關係時，表示：「兩個大國之間，特別是像中、印這樣兩個接壤的大國之間，一定會有某些問題，……只要根據「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處」的原則，任何業已成熟的懸而未決的

<sup>50</sup> 蔣一國等著，**印度國防經濟研究**（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頁5。

<sup>51</sup> 沈默，**地緣政治**（台北：中央圖書供應社，1967年7月），頁225。

<sup>52</sup> 印度是多宗教國家，三大宗教即印度教、伊斯蘭教和錫克教之間，時有衝突。1947年印、巴分治時，印度教伊斯蘭教信徒間發生大規模流血衝突，導致50萬人死亡、1,400萬人流離失所，之後，兩大宗教之間仍衝突不斷。葉自成主編，**地緣政治與中國外交**（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12月），頁431-432。

<sup>53</sup> 印度的種姓制度可回溯至數千年前的印度教起源，傳說有一位神明，身體的不同部份化身為社會的不同階層，彼此分工合作。神明的頭變成「婆羅門種姓（Brahmin Caste）」，由祭司和學者組成；手變成「刹帝利種姓（Kshatriya Caste）」，由官員、貴族和武士組成；大腿變成商人和地主組成的「吠舍種姓（Vaishya Caste）」；腳則變成技術工人與農夫組成的「首陀羅種姓（Shudra Caste）」。除了這四大種姓外，還有一種不在類別中的「賤民（Dalit, or as Untouchable）」，負責清理穢物等被視為不潔之工作。種姓制度不僅世代沿襲，且各階級禁止通婚，對印度社會影響甚大。「印度的種姓制度 神明身體化身而成」，**印度快訊**，創刊號（2007年3月25日），頁24。

<sup>54</sup> 張敏秋主編，**中印關係研究（1947-2003）**（北京：北京大學，2004年6月），頁164-168。



問題，都可以得到解決。」<sup>55</sup>

在中、印雙方互有善意的基礎上，1954年6月，中、印簽訂《關於中國西藏地方與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提出印度放棄了在西藏的特權，承認西藏是中國的領土，而中國則給予印度在通商方面某些方便。<sup>56</sup>由於中、印之間一直存有邊界領土爭議，印度自認放棄在西藏擁有的特權，中國自然應該投桃報李，因此，當尼赫魯於1954年10月應邀回訪中國時，不免希望中國在邊界問題上能有所讓步。而中國則將西藏問題與邊界爭議，視為帝國殖民主義所遺留下來的問題，西藏自始至終為中國的領土，中國願意給予印度在西藏通商某些便利，已表達極大的善意，至於邊界問題，則有待時機成熟後，透過談判予以解決。<sup>57</sup>雖然中、印在邊界問題上，仍偶有爭議，但印度不僅在聯合國中支持中國，更於1955年4月邀請中國參加由第三世界29個國家，在印尼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為中國開啟外交工作，扮演牽線搭橋的作用。

1955年至1958年，中印關係延續萬隆會議後的熱絡氣氛，持續高層互訪及展開包括軍事層面的全面交流活動。雖然邊界問題仍不時困擾著雙方，但基本上不妨礙中印關係發展。中印關係發生實質變化，主要與國際形勢變化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即在蘇聯的壓力下參與韓戰，耗費無數的金錢、裝備以及人命的代價，卻僅獲得不成比例的援助，但在離不開蘇聯的支持下，中國只能敢怒而不敢言；韓戰的勝利讓中國重新成為亞洲強權國家，另外1953年3月蘇聯領導人史達林死後，毛澤東成為社會主義陣營中最資深的領袖，也無法再容忍蘇聯的頤指氣使。<sup>58</sup>

史達林死後，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Khrushchev, Nikita），重新審視對亞洲政策，中蘇關係開始產生質變。為了與中國爭奪第三世界的領導權，遂將關注目標轉向印度，透過軍事、經濟方面援助，及支持印度在克什米爾問題上的立場，換取尼赫魯對蘇聯採取友好政策。1960年至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熾熱期間，蘇聯不僅站在印度這邊，指責中國挑起事端，更提供印度許多武器裝備。<sup>59</sup>

1959年12月，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訪問印度，答應提供經濟援助，而1961年美國總統甘乃迪上任後，更加明確支持印度遏制中

<sup>55</sup> 葉自成主編，*地緣政治與中國外交*（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12月），頁316-317。

<sup>56</sup> 張敏秋編，*中印關係研究（1947-2003）*（北京：北京大學，2004年6月），頁171。

<sup>57</sup> 葉自成，*中國大戰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11月），頁29。

<sup>58</sup> 艾里曼（Bruce Elleman），李厚壯譯，*近代中國的軍事與戰爭*（台北：時英，2002年），頁432-433。

<sup>59</sup> 科亨（Stephin P. Cohen），劉滿貴等譯，*大象與孔雀：解讀印度大戰略*（北京：新華社，2002年10月），頁149。

國。<sup>60</sup> 看在中國的解讀，印度等於是成為在美、蘇支持下，反對中國的打手。最終在印度認為獲得美、俄支持足以與中國一戰，及中國為破解美、蘇、印合作圍堵，趁 1962 年美、俄因古巴飛彈危機無暇他顧下，<sup>61</sup> 爆發中印大規模的邊界戰爭。

中印邊界戰爭後，雙方除了在外交上進行相互指責外，實質交流活動陷入停頓局面。美國原本允諾繼續提供印度武器裝備，但在巴基斯坦的抗議下，美國為了確保與巴基斯坦的友好關係，不得不限制對印度的軍事援助，並最終於 1965 年停止對印度的援助。而蘇聯則成為印度最主要的軍備供應國。

由於中蘇關係發生變化，中國對中蘇邊界問題不再隱忍，導致 1964 年至 1969 年間，中蘇邊界爆發數以千計的小規模衝突事件。1968 年，蘇聯入侵捷克，並宣稱蘇聯有權介入其他共產國家的內部事務，北京的反應是公開指控蘇聯已成為「社會—帝國主義」國家；與此同時，在中國進行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如火如荼，種種情勢，終於 1969 年 3 月因珍寶島領土爭議，中、蘇爆發激烈的軍事衝突。<sup>62</sup>

1971 年 7 月 9 日美國國務卿季辛吉訪問中國後，宣佈尼克森總統將於 1972 年訪中，蘇聯外長葛羅米柯（Gromyko, Andrey Andreyevich.）隨於 1971 年 8 月 8 日赴印度訪問，雙方並簽訂為期 20 年具有軍事同盟意義的《和平友好條約》。<sup>63</sup> 印度在獲得蘇聯的支持下，隨後在 1971 年的印巴戰爭中，獲得決定性勝利。東巴基斯坦遭裂解獨立成為孟加拉，印度也取得了在南亞的強權地位。<sup>64</sup>

中蘇關係因 1969 年的珍寶島事件，呈現惡化與嚴重對立，加上美國因越戰泥沼導致國力衰退，面對蘇聯節節進逼的態勢，中、美在此時出現了共同的地緣政治利益，即制衡蘇聯的威脅。<sup>65</sup> 隨著美國國務卿季辛吉及尼克森總統先後訪中，毛澤東提出具有世界地緣政治觀的“一條線”及“一大片”<sup>66</sup> 戰略思想。1979 年，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為了阻止蘇聯南下印度洋的戰略，將巴基斯坦

<sup>60</sup> 張敏秋編，*中印關係研究（1947-2003）*（北京：北京大學，2004 年 6 月），頁 257-260。

<sup>61</sup> 張敏秋編，*中印關係研究（1947-2003）*，頁 266。

<sup>62</sup> 艾里曼（Bruce Elleman），李厚壯譯，*近代中國的軍事與戰爭*（台北：時英，2002 年），頁 432-433。

<sup>63</sup> 張文木，*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 年 5 月），頁 45。

<sup>64</sup> 孫士海編，*印度的發展及其對外戰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年 5 月），頁 278-279。

<sup>65</sup> 樓耀亮，*地緣政治與中國國防安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年 6 月），頁 112。

<sup>66</sup> 1973 年 2 月 17 日，毛澤東在會見美國國務卿季辛吉時表示，要搞一條橫線，就是緯度，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即這些處於同一緯度線的國家應連成一條戰略線。1974 年 1 月 5 日，毛澤東在會見日本外務大臣大平正芳時表示，除了一條線上的國家之外，還要把這條線外的亞、非、拉一大片都團結起來，共同對付蘇聯的霸權主義行徑。樓耀亮，*地緣政治與中國國防安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年 6 月），頁 122。

成為與蘇聯對抗的重要基地，透過巴基斯坦向阿富汗游擊隊進行援助。<sup>67</sup> 整體的情勢是，蘇、印建立實質同盟關係，而中美關係解凍，基本上，在南亞形成「美、中、巴基斯坦」與「蘇、印」對抗的戰略格局。<sup>68</sup>

1984年10月31日，印度總理甘地夫人（Gandhi, Indira）遇刺身亡，代表中國前往印度參加甘地夫人葬禮的副總理姚依林，向繼任甘地夫人成為印度總理的甘地夫人之子拉吉夫·甘地發出訪中邀請，但因印度國內情勢複雜，拉吉夫·甘地未能實現訪中。1986年11月，俄共總書記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訪印期間表示，如果中印關係發生危機，蘇聯不一定有義務要支持印度。印度領導階層為避免陷入孤立無援境地，開始思考如何重新定位及引導中印關係的走向。1988年戈巴契夫訪中，正式開啟俄中關係正常化的進程，也促使印度不得不朝印中關係正常化方向推進。

回顧冷戰時期中印關係發展的歷程，可以歸納其中地緣政治因素如次：

#### 壹、地緣政治利益的結合

由於印度的文化優勢，加上擁有其他南亞國家難以競爭的地理資源及經濟與軍事實力，<sup>69</sup> 印度開國總理尼赫魯在印度獨立前，一直存有「大印度聯邦」的構想，將「印度文化圈」<sup>70</sup> 內的南亞諸國視為印度的勢力範圍，不能容許他人染指。

印度總理尼赫魯曾在其1944年所著的**印度的發現**乙書中指出：「在將來，太平洋將要代替大西洋而成為全世界的神經中樞。印度雖然並非是一個直接的太平洋國家，卻不可避免地將在那裡發揮重要的影響。在印度洋地區，從東南亞一直到中亞細亞，印度必將要發展成為經濟和政治活動的中心。……印度以它所處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麼就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麼就銷聲匿跡。」因此，印度獨立後，執政的國大黨根據印度的地緣政治條件，及當時的國際形勢與安全環境，擬定國家戰略方針主要有兩點，就是謀求成為印度洋大國及謀求印度成為有聲有色的世界大國。<sup>71</sup>

#### 一、印度的不結盟政策

然而印度獨立後，面對美、蘇對立隱然成形的國際環境，及國內政局動盪不安

<sup>67</sup> 葉自成主編，**地緣政治與中國外交**（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12月），頁435。

<sup>68</sup> 張敏秋編，**中印關係研究（1947-2003）**（北京：北京大學，2004年6月），頁269。

<sup>69</sup> 蔣一國等著，**印度國防經濟研究**（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頁3。

<sup>70</sup> 印度文化圈，泛指直接受印度主體文化影響的地區，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不丹、錫金、孟加拉、緬甸和中國的中藏等地區。吳永年等著，**21世紀印度外交新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頁20。

<sup>71</sup> 蔣一國等著，**印度國防經濟研究**（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頁7-8。

情勢，尼赫魯並不想與美、蘇結盟，卻也不想與美、蘇交惡，因此尼赫魯藉著美、蘇都想拉攏印度的機會，提出了「不結盟」對外政策。1947年1月，尼赫魯在一個給印度駐華大使梅農（K.P.S. Menon）的工作指示中，說明了印度不結盟政策的基本原則。尼赫魯表示：「我們的基本政策是避免為大國政治所糾纏，不加入任何大國集團。當今世界上兩大領導集團是俄國集團和美國集團，我們必須同兩者友好而又不加入一方。美、蘇兩國除了彼此極端猜疑外，還懷疑其他的國家，這就給我們政策選擇增加了難度，它們會懷疑我們傾向其中一方，這對印度毫無益處。我們的外交政策從根本上講，是取決於我們的國內政策，這一政策決不是反對共產主義，相反它明確反對印度共產黨。然而在印度，不僅存在一股很強大並持續上升的贊成社會主義社會秩序的某種模糊感情，而且還有對美國的深厚友誼，並期待美國在許多領域特別是科技領域幫助印度。蘇聯作為我們的鄰邦，我們將注定同它發生密切的關係，我們不能因為其他國家的不滿而與俄國敵對，當然我們也不能同美國敵對。」<sup>72</sup>

印度不結盟政策的具體內容主要為：避免與任何國家或反對另一個國家的集團結盟，尋求與所有國家的友好關係；不結盟不是把自己孤立起來，而是在一國的外交政策中追求獨立自主；反對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支持被壓迫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鬥爭；積極倡導和堅持和平共處五原則；引進外援，只要是對印度的經濟發展有利。<sup>73</sup>尼赫魯希望能夠周旋於美、蘇兩大集團之間，為印度贏得有利的時間與穩定的國際環境，實行保全印度、發展印度、壯大印度實力的戰略目標，最終使得印度能夠成為美、蘇兩大陣營之外的第三勢力領袖，提高印度的國際地位，真正成為亞洲的中心。<sup>74</sup>

## 二、新中國成立後的孤立處境

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尼赫魯基於當時印度所處的地理環境與內外情勢，決定採取與中國交好的政策，印度也成為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非社會主義國家。隨後印度不僅在聯合國支持中國，在韓戰期間反對美國提出指責中國為侵略者的提案，甚至於1954年4月與中國在敏感的西藏問題上達成協議。<sup>75</sup>

由於尼赫魯多次公開表達反對共產主義的立場，<sup>76</sup>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在回覆印度共產黨書記處總書記拉納迪夫（B.T. Ranadive）的賀電時說到：「中國人民相信，依靠印度所有愛國者的團結及鬥爭，印度肯定不會長期屈服於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治之下。……如同解放了的中國一樣，一個自

<sup>72</sup> 牛大勇、沈志華，*冷戰與中國的周邊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頁491。

<sup>73</sup> 吳永年等著，*21世紀印度外交新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頁23-24。

<sup>74</sup> 吳永年等著，*21世紀印度外交新論*，頁48。

<sup>75</sup> 吳永年等著，*21世紀印度外交新論*，頁59。

<sup>76</sup> 牛大勇、沈志華，*冷戰與中國的周邊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頁496。

由的印度，終將有一天會出現在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大家庭裡。」<sup>77</sup>因此尼赫魯在毛澤東的眼中，顯然是一個必須打倒的敵人。然而由於尼赫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多次表達善意，而中國在經歷韓戰後，面對美國多方包圍的遏制，儘管中、印兩國因西藏問題而時有齟齬，但雙方在基本上仍維持友好的氣氛。1953年，中國總理周恩來在提到中印關係時，仍然強調：「兩個大國之間，特別是像中印這樣兩個接壤的大國之間，一定會有某些問題，……只要根據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處的原則，任何業已成熱的懸而未決的問題，都可以得到解決。」<sup>78</sup>因此中國不得不暫時拋開意識形態的堅持，從雙方的共同利益點出發，<sup>79</sup>尋求建立中、印彼此間穩定的雙邊關係。

在地緣利益的考量下，「合則兩利，鬥則兩傷」成為中、印雙方領導人願意拋開諸多歧見，而凝聚成的共識。這也是中印關係在1950年代中期前，能夠維持密切交往，在國際間相互合作的最根本因素。

## 貳、地緣戰略思維的衝突

從地理上來看，中印邊界大體呈現三種地貌：北面是西藏高原，中間是以喀喇崑崙山脈和喜馬拉雅山脈為主的山地，做為兩國的天然屏障，向南是恆河平原；由西向東，阿克賽欽高原北接帕米爾高原，西與阿富汗接壤，東連西藏；東段平均海拔相對較低，有重要山口通向南亞。在18世紀中葉印度淪為英屬殖民地之前，中印邊界僅存在一條經由行政管理而形成的傳統習慣線。<sup>80</sup>中、印雙方相安無事。

### 一、獨立的印度沿襲大英帝國的戰略思維

英國統治印度期間，基於印度的地理特點和周邊環境，在以西藏做為中、印之間的緩衝國，避免印度受到中國威脅的思維下，透過占領錫金、控制尼泊爾、強迫中國清政府簽訂《中英會議印藏條約》，及在未經清政府同意下，與西藏簽訂《拉薩條約》，取得在西藏的特權。<sup>81</sup>1911年，中國辛亥革命，英國為徹底排除中、俄在西藏的勢力，於1913年10月13日策劃了中、英、藏三方參加的西姆拉會議，討論內藏、外藏的界線和西藏同中國其他部分之間的界線。而後英國背著中國政府，以壓制中國同意西藏獨立為餌，誘使西藏政府將中

<sup>77</sup> 牛大勇、沈志華，*冷戰與中國的周邊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頁503。

<sup>78</sup> 葉自成主編，*地緣政治與中國外交*（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12月），頁316-317。

<sup>79</sup> 1954年10月，毛澤東在與尼赫魯的會談中表示：儘管我們在思想上、社會制度上有所不同，但是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要對付帝國主義。牛大勇、沈志華，*冷戰與中國的周邊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頁503。

<sup>80</sup> 陳會娟，「中印邊界糾紛中的地緣因素」，*南亞研究季刊*（北京），2004年第4期，頁96。

<sup>81</sup> 陳會娟，「中印邊界糾紛中的地緣因素」，*南亞研究季刊*（北京），2004年第4期，頁97。

印邊界東段約 9 萬平方公里土地劃給印度，即所謂的「麥克馬洪 (McMahon) 線」<sup>82</sup>。英國政府將此段界線標誌在西姆拉條約的附圖中，惟中國政府並未簽字，亦不承認英國與西藏所簽訂相關條約或協定的效力。<sup>83</sup> 印度獨立後，據此作為界定中印邊界的依據，此即中、印雙方對邊界東段爭議的由來。這也是中國學者認為中印邊界問題是歷史遺留的問題所在。<sup>84</sup>

圖 3-2：中印邊界爭論地區



資料來源：<http://www.netwish.net/junshi/zcsh/india/ziliao/7.htm>。

<sup>82</sup> 所謂“麥克馬洪線”，是 1914 年 7 月，英、印雙方私背當時中國政府，以秘密換文方式所劃之康、藏南部界線，即英、印地圖依據之康、藏、印邊界線，與中國地圖相差約達 5 萬方哩。當時英、印換文時，英國首席代表為麥克馬洪 (McMahon)，故稱之為“麥克馬洪線”。沈默，*地緣政治*（台北：中央圖書供應社，1967 年 7 月），頁 219。

<sup>83</sup> 張敏秋主編，*中印關係研究（1947-2003）*（北京：北京大學，2004 年 6 月），頁 66。

<sup>84</sup> 康民軍，「試析中印邊界問題的歷史與現狀」，*南亞研究季刊*（北京），2006 年第 1 期，頁 55。



印度對中印邊界立場的堅持，不純然是政治上的因素，其地緣戰略利益的考量，亦不可忽視。<sup>85</sup>「麥克馬洪線」對印度而言是一條戰略邊界線。從地理上看，「麥克馬洪線」的大體走向是，自不丹以東，沿著喜馬拉雅山主脊，越過雅魯藏布江後，到達達梅恩開江與怒江分水嶺的伊索拉希山口。藉由「麥克馬洪線」，將中印邊界從喜馬拉雅山山麓提高到了山脊，等於是將印度邊界從容易暴露的山麓提升到阿薩姆邦喜馬拉雅山山頂之上，使得印度得到一個與中國腹地之間一個實際的地理緩衝區，<sup>86</sup>從而增加了印度的安全利益。

印度獨立後不久，承襲英國殖民印度期間，把南亞次大陸的鄰國及西藏，當作防止中國勢力入侵緩衝區的戰略構想，透過與鄰邦不丹、錫金、尼泊爾、緬甸及錫蘭等小國簽訂友好或和平條約，繼承了殖民時期英國對這些國家所擁有的特權。<sup>87</sup>也建立起防範中國的喜馬拉雅山安全體系。

## 二、新中國對西藏主權的行使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顧印度駐華大使的警告，於1950年10月19日解放了西昌，印度政府於10月21日、28日及11月1日，短短時間內連續三次照會中國，指責中國入侵西藏是可悲的行為，甚至曾經考慮派遣遠征軍前往西藏拉薩對抗中國人民解放軍，<sup>88</sup>但最終仍無法改變中國對西藏行使主權的結局。由於中國不顧印度的警告，以武力恢復對西藏行使主權，印度感受強烈的安全威脅。<sup>89</sup>也因此為兩國爾後長期的邊界糾紛，埋下軍事衝突的因素。

1954年7月至1955年6月，中、印雙方就國界東段的巴拉霍蒂（Barahoti）主權歸屬進行宣示，並互指對方侵犯主權，邊界緊張情勢陸續升高。1958年印度政府認為中國修築的公路侵犯了印度領土，而向中國提出抗議。<sup>90</sup>

由於中、印對於邊界問題的不同立場，雙方透過外交進行交涉的同時，各自在邊界地段加強軍事部署，占領對己方有利的戰略位置，並於1958年底在邊界上基本形成對峙的態勢。<sup>91</sup>1959年3月，中國派兵鎮壓西藏暴亂（西方國家稱為西藏抗暴運動），印度不顧中國的抗議，庇護了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

<sup>85</sup> 樓耀亮，*地緣政治與中國國防安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頁167。

<sup>86</sup> 陳會娟，「中印邊界糾紛中的地緣因素」，*南亞研究季刊*（北京），2004年第4期，頁98。

<sup>87</sup> 科亨（Stephin P. Cohen），劉滿貴等譯，*大象與孔雀：解讀印度大戰略*（北京：新華社，2002年10月），頁136。

<sup>88</sup> 張敏秋編，*中印關係研究（1947-2003）*（北京：北京大學，2004年6月），頁22。

<sup>89</sup> 孫士海編，*印度的發展及其對外戰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5月），頁273。

<sup>90</sup> 艾里曼（Bruce Elleman），李厚壯譯，*近代中國的軍事與戰爭*（台北：時英，2002年），頁445。

<sup>91</sup> 陳會娟，「中印邊界糾紛中的地緣因素」，*南亞研究季刊*（北京），2004年第4期，頁100。

Dalai Lama)。達賴喇嘛在印度流亡期間，不僅譴責中國對西藏的“侵略”，還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中，指稱中國在西藏的統治為“恐怖時期”，宣稱 1951 年中國與西藏簽訂的條約是“以刺刀的刀尖捅進了西藏”。<sup>92</sup>

### 三、中印爆發邊界軍事衝突

中印關係受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事件影響開始惡化，儘管當時毛澤東基本想法仍是：「中國與印度沒有重大地緣政治衝突和矛盾，中國不能放棄地緣政治的主要方向與印度成為敵人，這會使中國處於極不利的兩線受敵的境況，是中國必須要注意避免的。……印度沒有參加東南亞條約組織，印度不是我國的敵對者，而是我國的友人。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於美國，西方又樹敵於印度。……幾年來，特別是最近三個月，我們兩國之間的吵架，不過是我們兩國千年萬年友好過程中的一個插曲而已，值不得我們兩國廣大人民和政府當局為此而大驚小怪。」<sup>93</sup>但中國解放軍與印度軍隊仍持續在具爭議性的邊界，發生數起小規模的軍事摩擦。<sup>94</sup>其中「朗久事件」<sup>95</sup>和「空喀山口事件」<sup>96</sup>，則為 1962 年中印邊界戰爭拉開了序幕。<sup>97</sup>

「朗久事件」和「空喀山口事件」後，中、印雙方仍持續在邊界爆發一些零星的衝突，但大體透過外交手段企圖解決領土爭議，惟由於認知差距太大，而淪為各據一詞，各說各話的情況。同時，雙方也加緊進行軍隊的調動與部署，為可能即將到來的戰爭做好準備。

1962 年 9 月初，印度軍隊發現中國軍隊越過麥克馬洪線幾乎抵達至塔格拉山脊的位置。印度的媒體立即以帶有民族情緒的語氣，要求將中國軍隊逐出印度國境。至 9 月下旬，中、印軍隊已沿著麥克馬洪線爆發數起小規模的戰鬥。10 月初，中印邊界衝突情勢一觸即發，印度方面制定了「來克亨作戰行動」（Operation Leghorn），於 10 月 10 日與中國軍隊爆發「僧崇之戰」，雙方互有數十人傷亡。面對隨後印度不斷增兵加強設防固守的態勢，中國也毫不退讓，

<sup>92</sup> 艾里曼（Bruce Elleman），李厚壯譯，*近代中國的軍事與戰爭*（台北：時英，2002 年），頁 447。

<sup>93</sup> 葉自成，*中國大戰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 11 月），頁 27。

<sup>94</sup> 艾里曼（Bruce Elleman），李厚壯譯，*近代中國的軍事與戰爭*（台北：時英，2002 年），頁 443。

<sup>95</sup> 朗久係西藏馬及墩地區南端的一個村子，是中印邊界的一個隘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1959 年 8 月 25 日，中、印部隊在此爆發武裝衝突，造成印軍數人傷亡。事後，印度政府向中國提出抗議，指責中國軍隊侵犯印度；中國則聲稱是邊防部隊被迫進行自衛還擊。

<sup>96</sup> 空喀山口位於中印邊界西段，中、印雙方對此段領土存有爭議，並均設有哨所相互對峙。

1959 年 10 月 20 日，印度由兩名特種員警和一名挑夫組成的小分隊到達空喀山口，遭中國方面扣押；隔天該印度特種員警部隊司令官率 70 多名武裝人員與中國部隊發生武裝戰鬥，印軍多人傷亡及被俘。印度政府指責中國侵略印度領土，並調動軍隊，強化邊界地區兵力。

<sup>97</sup> 張敏秋編，*中印關係研究（1947-2003）*（北京：北京大學，2004 年 6 月），頁 76。



迅速調動大軍做為回應。

1962年10月20日清晨，中印戰爭不宣而戰，雙方在邊界東段塔格拉山脊（ThagLa ridge）下的克節朗河首先爆發戰鬥，中國軍隊立即取得優勢，印度軍隊則一路退守，至24日，中國軍隊攻陷位於麥克馬洪線以南十英里的蘭普（Lampu），迫使印度軍隊自達旺（Tawang）撤退。此外，中國軍隊也於10月20日同步在中印邊界西段的拉達克（Ladakh）展開攻勢，佔領印度多個哨所。中印邊界戰爭的第一階段，以中國大勝、印度慘敗，做為收場。<sup>98</sup>

10月24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表示願意舉行談判，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並提出建議：「中、印雙方在邊界問題和平解決之前，中、印雙方武裝部隊各自從實際控制線後退20公里；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項建議的前提下，中國願意經由協商將邊界東段的中國邊防部隊撤回實際控制線以北，在邊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雙方保證不越過實際控制線；中、印兩國總理舉行會談，謀求友好解決邊界問題。」針對中方聲明，印度政府當天即提出回應，印方要求中方應先將部隊撤退至1962年9月8日前在邊界的位置，印度則同意雙方進行任何層級的會談與討論。<sup>99</sup>由於雙方立場無法交集。印度政府一方面宣佈全國處於“緊急狀態”，頒布《保護印度法令》，進行戰爭動員，增兵邊界，另一方面則透過外交作為，籲請美國提供軍備。

第二階段戰鬥於11月14日在中印邊界東段東部的瓦弄，由印軍發動攻擊做為起始，同樣是印軍潰敗，至20日中國解放軍攻抵中國認定的中印傳統習慣線，並於21日由中國片面宣佈停火作為結束。此外，印度在中印邊界西段爭議部分所設立的多個哨所，也遭中國武力清除。<sup>100</sup>

對於中國是中印邊界戰爭的勝利者，少有人提出質疑；但除了中國之外，認為中國是侵略的一方，則是普遍的共識，<sup>101</sup>甚至有西方學者認為中印邊界戰爭，是中國的第二次現代帝國主義戰爭。<sup>102</sup>中國於1962年11月21日主動宣佈停火，隨後並讓解放軍從實際控制線後撤20公里，但卻不願接受由阿拉伯聯

<sup>98</sup> 艾里曼（Bruce Elleman），李厚壯譯，**近代中國的軍事與戰爭**（台北：時英，2002年），頁450。

<sup>99</sup> 張敏秋編，**中印關係研究（1947-2003）**（北京：北京大學，2004年6月），頁92-93。

<sup>100</sup> 張敏秋編，**中印關係研究（1947-2003）**，頁94-95。

<sup>101</sup> 在中、印爆發邊界戰爭時，公開表示支持中國的僅有越南、北韓、緬甸及巴基斯坦，而反對中國行動，同情和支持印度的國家則高達有75個。牛大勇、沈志華，**冷戰與中國的周邊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頁539-541。

<sup>102</sup> 美國戰爭學院副教授艾里曼（Bruce Elleman）認為，1950年韓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第一次現代帝國主義戰爭；1962年中印邊界糾紛是第二次；1969年中蘇衝突是第三次；1979年中越戰爭是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帝國主義戰爭。艾里曼（Bruce Elleman），李厚壯譯，**中國的軍事與戰爭**（台北：時英，2002年），頁403、435、463、489。

合共和國、柬埔寨、迦納、緬甸、斯里蘭卡及印尼等 6 個亞非不結盟國家代表團，於 1962 年 12 月在斯里蘭卡可倫坡商議提出，且已獲印度政府認可的「可倫坡提議」。<sup>103</sup> 許多評論家對中國真正的意圖看法分歧，但是中國學者張文木從地緣政治角度提出他的看法，張文木認為，當時中國取得的勝利僅僅是險勝，因為裝備運補困難，如果印度採取拖延戰略，這場中印邊界戰爭，將對中國經濟發展造成不利影響。<sup>104</sup> 這個的觀點，應是較為客觀中立，且符合當時中國領導階層思慮的看法。

儘管印、中在 20 世紀 40 年代末期先後擺脫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枷鎖後，雙方領導階層及一般民眾當中，一直存在對彼此不同甚至對立的看法。但主流的意見是，中、印必須相互扶持，發展友好關係。<sup>105</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印度總理尼赫魯力排眾議，使得印度成為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非社會主義國家，並在聯合國安理會中，支持蘇聯提案排除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之後，在韓戰期間，反對聯合國對中國實施制裁，協助中國參加萬隆會議擴展外交關係，印度自認對中國已仁至義盡。中國對印度友好舉措，並非完全無動於衷，因此，對於印度繼承了英國在西藏的許多特權，中國在實施“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外交方針時，對印度採取了與對英、美等西方國家不同的態度。

由於領土糾紛，涉及國家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利益，在印度方面，印度認為中印邊界早經兩國正式簽約認定，依法有據。但在中國方面，1949 年 10 月 1 日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由中國共產黨高舉民族主義大旗，獲得人民支持而成立的，在脫離半殖民地的地位後，一旦在領土問題的立場退讓，恐將危及其執政基礎。因此，雙方對邊界問題的態度，儘管主張和平解決，但對屢次的邊界問題而卻不約而同採取強硬立場，導致小規模的軍事衝突事件不斷。

1962 年的中印邊界戰爭，可以說是中、印之間地緣戰略衝突之下的必然結果。作為落敗的一方，存在於印度一般民眾中，對中國抱持友善的看法，被徹底地粉碎；也讓印度領導階層確信，中國在實施支持以侵略與領土擴張為基礎的外交政策。<sup>106</sup> 更為爾後中印關係的開展，製造了一個難以跨越的巨大鴻溝。

### 參、地緣政治格局的糾葛

---

<sup>103</sup> 艾里曼 (Bruce Elleman)，李厚壯譯，*近代中國的軍事與戰爭* (台北：時英，2002 年)，頁 443。

<sup>104</sup> 張文木，*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 (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 年 5 月)，頁 36。

<sup>105</sup> 張敏秋編，*中印關係研究 (1947-2003)* (北京：北京大學，2004 年 6 月)，頁 4。

<sup>106</sup> 艾里曼 (Bruce Elleman)，李厚壯譯，*近代中國的軍事與戰爭* (台北：時英，2002 年)，頁 453。

## 一、美中印地緣關係

不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所採取的“一邊倒”政策，由於堅持不結盟政策，在 1950 年代初期，印度與美、蘇兩大強權基本保持著等距交往的關係。1955 年，蘇聯基於拉攏印度的需求，開始對印度提供經濟援助，印蘇關係明顯獲得提升，而美國則為此深感憂慮。美國總統艾森豪表示：「如果印度與蘇聯結盟，這對美國而言將是一場政治、戰略和心理上的災難。……美國過去對印度關注不夠，政府應改變只向軍事盟國提供經濟援助的方針，加強對印度的援助。」艾森豪認為，讓印度這樣的大國保持一種傾向美國的中立，對西方是很有利的。1957 年，美國政府通過了「NSC-5703 號」文件，該文件認為：「蘇聯正在南亞地區展開外交和經濟攻勢，印度是蘇聯的主要目標。美國的對印政策正面臨著困境，印度的不結盟政策與美國的立場經常發生衝突，如果由於美國的經濟援助而使印度的力量得到加強，印度可能會成為中立主義更有力的代言人，而中立主義是與美國的利益相衝突的。但是，一個軟弱和脆弱的印度最終可能比一個穩定與有影響力的印度有著更大的風險，……一個強大的印度在亞洲背景下可能是替代共產主義的成功典範。」這個文件透露出的意涵表明，美國準備調整對印政策，利用印度來削弱中國的影響。並最終導致美國政府於 1958 年 3 月宣布為印度的五年經濟計畫提供 7,500 億美元的金融援助。<sup>107</sup>

1961 年面對中印邊界日益頻繁的武裝衝突，美國甘迺迪總統在指派多位政府高層人士至印度訪問，探視印度對組織一個針對中國的“亞洲力量平衡體系”的態度後，調整美國的南亞政策方向為：「美國將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印度的不結盟立場，以換取印度加強親美的方向政，促使印度成為美國遏止中國的戰略夥伴。」儘管美國對印度多次釋出善意，但 1961 年 11 月，尼赫魯訪問美國，與甘迺迪的會談中，卻沒有給予美國具體的承諾。1962 年 10 月，中印邊境戰爭爆發，為美印關係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契機。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由負責南亞事務的科爾默（Robert Komer）領導特別小組委員會所提出報告指出，中印衝突帶來了重要的機會，它可能導致印、巴兩國和解，使一個覺醒與實力加強印度加入對紅色中國的遏制。報告強調，美國的戰略利益應該是保持高強度的中印磨擦，但應防止它蔓延成為一場大規模的戰爭。報告最後提出了 3 項建議：第一，讓英國和英聯邦國家出面擔任主要角色；第二，給印度的防空提供某種援助；第三，在克什米爾問題上要有非常巧妙的策略。<sup>108</sup>

由於印度採取不結盟政策，在 1950 年代初期，美印關係發展並不熱絡，但美國基於遏制中共的戰略需求，並藉著中印邊界問題，開始提供印度在經濟及軍事方面的協助，不僅強化了印度與中國軍事對抗的信心，也間接促成了 1962

<sup>107</sup> 陶文釗、杜瑞清、王旭主編，*中美關係與東亞國際格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頁 323-325。

<sup>108</sup> 陶文釗、杜瑞清、王旭主編，*中美關係與東亞國際格局*，頁 327-335。

年的中印邊界戰爭。

## 二、美中印巴地緣關係

出於對印度可能進犯的不安全感，巴基斯坦在建國之後即與美國維持良好的關係，並於 1954 年 5 月與美國簽訂共同防禦協議，加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軍事同盟，成為東南亞條約組織的成員。面對中國的懷疑，巴基斯坦向中國提出的解釋是，巴基斯坦加入東南亞條約組織，是為了保護自己不受印度的侵略，而非反對中國，巴基斯坦不會參加美國發起針對中國的戰爭。此一時期，雖然中、巴之間保有高層領導人的互訪，但整體而言，中巴關係是處於“不冷不熱”的狀態。1950 年代後期，巴基斯坦國內情勢出現變化，陸軍司令阿尤布·汗（Mohammed Ayub Khan）成立新政權，積極向美國靠攏。隨著中印邊界衝突情勢愈演愈烈，阿尤布·汗於 1959 年 9 月訪問印度，企圖說服印度在南亞建立共同防禦計畫，減少各自在印巴邊境的軍事力量。顯然，阿尤布·汗是想利用印度在軍事上面臨兩線作戰的不利局面，以對巴基斯坦有利的條件，解決克什米爾問題。<sup>109</sup>

由於美國對印度重視的程度超出巴基斯坦的預期，面對美國主動向印度伸出友誼之手，在中印邊界戰爭後，向印度提供軍事援助，及要求巴基斯坦與美、印攜手共同對抗北方的共產主義威脅時，巴基斯坦首先感到的是美國背叛了巴基斯坦。因此，基於敵人的敵人是朋友的傳統地緣政治觀念下，巴基斯坦轉而爭取中國支持共同對抗印度。而中國同樣從地緣政治的角度思考，希望拉攏巴基斯坦，以堵住美、印利用巴基斯坦包圍中國的企圖。<sup>110</sup>1962 年 12 月 26 日，中、巴兩國發表聯合公報，宣布兩國邊界問題已取得原則協議。1963 年 1 月，中、巴兩國又簽訂了第一個貿易協定，同年 3 月 2 日，巴基斯坦外長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至北京與中國簽訂《關於中國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實際控制其防務的各個地區相接壤的邊界協定》。自此之後，巴基斯坦開始疏離美國，而親向中國。<sup>111</sup>並在 1965 年 9 月的第二次印巴戰爭中，獲得中國的支持，於戰爭結束後，在南亞體系中形成了一種準同盟的關係。<sup>112</sup>

## 三、蘇中印巴地緣關係

中蘇邊界一直存有爭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因為亟待蘇聯的援助，因此對蘇聯在帝俄時期侵佔中國領土之事，始終採取隱忍的態度。1950 年代

<sup>109</sup> 牛大勇、沈志華，*冷戰與中國的周邊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 年），頁 464-470。

<sup>110</sup> 牛大勇、沈志華，*冷戰與中國的周邊關係*，頁 476。

<sup>111</sup> 陶文釗、杜瑞清、王旭主編，*中美關係與東亞國際格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頁 361-362。

<sup>112</sup> 牛大勇、沈志華，*冷戰與中國的周邊關係*，頁 485。

中期，由於蘇聯外交政策的轉變，及中國在一些重大國際問題和對國際形勢的判斷上，同蘇聯產生分歧，中蘇關係形同貌合神離。1959 年中印邊界爆發多次武裝衝突事件，中國認為蘇聯明顯偏向印度一方，加深了中蘇關係之間的裂痕。中蘇關係出現裂縫之後，中國對中蘇邊界爭議的態度開始轉趨強硬，蘇聯也對中國處理中印邊界問題的”好戰方式”有所警覺，<sup>113</sup>進而在 1962 的中印邊界戰爭中支持印度一方。1960 年代末期，中蘇邊界出現多次衝突事件，最終於 1969 年爆發中蘇珍寶島衝突事件。

巴基斯坦在獨立之後，出於國家利益的考量，加入以美國為主的西方軍事同盟體系，因而成為蘇聯的眼中釘。加上蘇聯在印、巴之間的克什米爾問題上，支持印度的立場，因此蘇巴關係始終保持冷淡。面對印度在美、蘇之間左右逢源，巴基斯坦只能選擇靠向中國。雖然巴基斯坦倒向中國，但是印度卻沒有倒向美國。印度自獨立後在國際上即採取不結盟政策，中印邊界衝突白熱化後，印度為了爭取美國提供軍事援助，面對美國要求與巴基斯坦協商談判克什米爾領土問題的壓力，儘管有所不滿，卻不能不虛與委蛇，然而克什米爾領土問題，涉及國家主權，無可退讓，因此雖然與巴基斯坦舉行了 3 輪的邊界問題談判，最後仍宣告失敗。加上美國內部仍有許多軍方與國務院的官員，因擔心激怒巴基斯坦，而拖延美國對印度的許多經濟、軍事援助，對美國感到失望的印度，乃轉而向蘇聯尋求協助，並獲得出乎意料之外的收獲。<sup>114</sup>

1971 年 7 月，美國國務卿季辛吉訪問中國後，宣佈尼克森總統將於 1972 年訪中，而對美、中可能聯手的局勢，蘇聯外長葛羅米柯隨即安排隔月訪問印度，迅速簽訂了具有軍事同盟意義的《和平友好條約》。印度自此在地緣戰略上倒向蘇聯一方。而隨著中美關係的改善，南亞地區也逐漸形成「印俄」對抗「巴中美」的區域地緣政治格局。

#### 第四節 小 結

二次大戰結束後，印度獲得獨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雙方面對共同的惡劣地緣政治環境，均有意發展良好關係。印度不僅在聯合國中支持中國，更於 1955 年 4 月邀請中國參加由第三世界 29 個國家，在印尼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為中國開啟外交工作，扮演牽線搭橋的作用。中、印領導人期望兩國能相互合作，真正成為兄弟之邦。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中印關係發展出一段蜜月期。

但由於西方帝國主義入侵，所遺留下來的歷史邊界問題，卻成為兩國開展

<sup>113</sup> 牛大勇、沈志華，*冷戰與中國的周邊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 年），頁 516。

<sup>114</sup> 陶文釗、杜瑞清、王旭主編，*中美關係與東亞國際格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頁 363-365。

關係的絆腳石。對中國而言，維護領土主權完整，係其政權獲得人民支持的重要基礎，自無退讓的可能，而就印度而言，與中國邊界領土的爭議，更涉及到國家安全戰略的調整，一旦退讓，國家安全即受到威脅。因此，在傳統地緣政治思維下，對於領土主權利益的爭奪，最終導致爆發邊界戰爭。

儘管毛澤東體認中國應避免與印度為敵，讓中國陷入極不利的兩線受敵（東方樹敵於美國，西方樹敵於印度）的境況，但戰爭終究爆發了。之後，中國全力投入「兩彈一星」計畫，於1964年成功完成核武試爆，躋身核武國家行列。並在地緣政治上出於牽制印度的考量，致力發展與巴基斯坦關係，簽訂中巴邊界協定，提供軍備，在1965的印巴戰爭中，支持巴基斯坦，<sup>115</sup>成為巴基斯坦主要的武器供應國。<sup>116</sup>

中印戰爭同樣惡化了印度的地緣政治環境，身為公認戰敗的國家，中印邊界戰爭，從根本上轉變了印度領導階層的對外政策思維，從理想主義的先趨，轉變成現實主義奉行著。<sup>117</sup>由於印度認為中國利用印、巴在克什米爾問題上的分歧，通過支持巴基斯坦的立場，來牽制印度，使中國在南亞獲得某種地緣優勢，<sup>118</sup>印度乃開始向蘇聯靠攏，蘇聯不僅擴大對印度的援助，並成為印度最主要的武器供應國。<sup>119</sup>中印關係自此轉為中國聯合巴基斯坦對抗印度聯合蘇聯的關係。

中印邊界戰爭不僅是讓兩國關係進入冷凍期，並且從而改變雙方的地緣戰略。尤其是中國於1964年完成核武試爆後，使印度感受到嚴重的不安全感，中國取代巴基斯坦，成為印度最大的安全威脅，而這種認知，甚至在冷戰結束後，仍影響中印關係的正常發展，一直到1998年，印度也成功完成核武試爆後，才逐漸獲得改善。

1969年中蘇關係因珍寶島事件正式決裂，中美關係則獲得改善，基於「對手的對手就是朋友」的原則，中、印也相互拉攏或靠向對方的對手，以牽制對方的發展，最終在二次大戰後，美、蘇對抗的世界地緣政治格局下，形成「印俄」對抗「巴中美」的區域地緣政治格局。中印關係也進入對峙期，一直到中蘇關係正常化，冷戰結束後，中印關係才恢復領導人的互動，並重新進入回暖期。

---

<sup>115</sup> 艾里曼 (Bruce Elleman)，李厚壯譯，**近代中國的軍事與戰爭**（台北：時英，2002年），頁458。

<sup>116</sup> 科亨 (Stephin P. Cohen)，劉滿貴等譯，**大象與孔雀：解讀印度大戰略**（北京：新華社，2002年10月），頁146。

<sup>117</sup> 孫士海編，**印度的發展及其對外戰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5月），頁276。

<sup>118</sup> 吳永年等著，**21世紀印度外交新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頁220。

<sup>119</sup> 張敏秋編，**中印關係研究（1947-2003）**（北京：北京大學，2004年6月），頁267。